

新文化运动与毛泽东早年妇女观

傅 扬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249)

【内容摘要】毛泽东早年妇女观主要反映在1919年他为长沙女子赵五贞自杀事件所写的评论文章及一些笔记、书信、谈话中,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世界观、人生观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毛泽东的早年妇女观的主要观点及与新文化运动的渊源。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 毛泽东 早年妇女观 渊源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1-0128-03

青年毛泽东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深受其影响,在“五四”运动后他又积极地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运动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关系至深。本文仅从毛泽东早年妇女观的角度探讨毛泽东理论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渊源。

新文化运动兴起于1915年,那时毛泽东已是22岁的青年,他离开闭塞宁静的山乡五六年了,曾在新式的学堂念过书,对于新式的思想如变法维新等等多少都有涉猎,辛亥革命中还曾在军队中历练了半年,眼界开阔了许多,但他的思想还不成熟,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在形成之中。

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他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担任修身、教育、伦理等课程的杨昌济老师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很大。经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开始阅读《新青年》,并很快就成为它的热心读者,甚至到了入迷的程度,“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1](P392)}对于《新青年》所倡导的“拥护德先生、赛先生”的主张他完全赞成,后来,毛泽东在主编《湘江评论》时,也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几乎可以说,这刊物是《新青年》在湘江之畔的回声。”^{[2](P102)}

经由《新青年》的媒介,毛泽东呼吸着新文化运动的气息,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他抛弃了早年崇拜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转而钦慕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和陈独秀,并与他们不同程度的直接接触。他曾与胡适通信,约请胡适与新民学会的会员谈话,也曾就出国留学的事向胡适咨询。不用说,胡适的文章毛泽东是非常认同的,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作为响应,他甚至想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3](P205)}比较而言,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更大。在与斯诺谈话时,他曾坦言:“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

任何人”^{[3](P115)}尤其在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陈独秀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毛泽东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就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陈独秀探讨过,他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3](P117)}。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更是积极地参加到新文化运动中来,他主笔《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发表文章宣传新文化的主旨,创办文化书社,销售进步书刊,组织学生联合会,策动抵制日货行动,领导驱张运动等等。毛泽东可说是长沙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在实践活动中受到洗礼,他的思想也渐渐地走向成熟。青年毛泽东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早年妇女观集中反映在1919年11月间他为长沙女子赵五贞自杀事件所写的评论文章中。1919年11月14日,长沙女子赵五贞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于出嫁当天在花轿中自杀。毛泽东就此事接连在《大公报》、《女界钟》杂志上发表了10篇文章,他的早期妇女观主要体现在这10篇文章及一些谈话、书信、文稿中。对于妇女问题,他主要有以下几点主张:

首先,他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他的这一主张主要是在抨击封建礼教、揭露中国妇女受奴役、受压迫的根源中表现出来的。在《女子自立问题》中他指出:“我国因数千年不正当的礼教习俗,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从政治、法律、教育,以至职业、交际、娱乐、名分,一概和男子分开做两样,退处于社会的暗隅。于不得幸福之外,还领受着许多不人道的虐待”^{[4](P383)}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为母亲去世写了《祭母文》,从中也能看出他对男女不平等的愤懑:“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4](P374)}毛泽东所关心的男女平等是考虑到政治、经济、教育、职业、交际、育儿等各个方面的。1919年

* 作者简介:傅扬(1968—),女,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上的由毛泽东草拟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就列出了关于女子问题的17项内容,可见毛泽东对男女平等的问题是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在行动上也表现出与思想的一致。由他和蔡和森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在1919年12月迎来了第一批女会员,这在当时属于领风气之先;另外,毛泽东积极支持妇女出国勤工俭学,他在一封给向警予的信中说:“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外出,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4](P493)}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女子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及贞操节烈观的禁锢下可说没有任何地位,男女之间极不平等。近代以来首先提出男女平等口号的是太平天国,但太平天国对妇女的重视主要是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男女地位并未见有实质性变化。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拉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序幕,他们反对“缠足”,兴女学,办女报,呼吁女权。自此以后,妇女解放运动时起时落,也曾取得一些成绩,唤醒了女性主体意识,但总的来说,妇女仍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状况。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新青年》从第一卷就开始登载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第二卷还开辟了“妇女问题”专栏,其他如《星期评论》、《晨报》、《民国日报》、《少年中国》等杂志也都辟有妇女问题专栏。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受到各方面力量的重视,参与的人员众多,涉及的领域广泛,理论探讨也非常深刻。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伦理观念进行总体性的批判,因而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建立在冲击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基础上的。毛泽东的男女平等思想也是从抨击传统父权制和男权制得以表达的,并且他主张男女之间全方位的平等,可见其所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其次,他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在论到赵女士自杀的问题时,他没有把它仅仅看做一个自杀事件来对待,而是从妇女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来阐发的。他说赵女士的死是环境逼迫使然,“一个人的自杀,完全由环境所决定”^{[4](P376)},这环境便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4](P377)}毛泽东接下来便痛斥传统的婚姻制度的弊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使得婚姻没有自由,男女之间的结合只是为了“讨亲”和“接后”,而不是以恋爱为基础,媒人说媒往往以撮合成功为根本,不顾及男女双方的性情、识见等等关乎人生幸福的方面,社会上又存在“婚姻命定说”等迷信为旧式的婚姻保驾护航,因而才有像赵五贞这样的悲剧出现。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还鞭挞了中国传统的贞操观,“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哪里?”^{[4](P344)}。他呼吁打破父母代办政策、打破媒人制度、破除婚姻上的迷信,建立以恋爱为基础的新式婚姻。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对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思想战线的革命。因而对旧的婚姻制度、贞操观念的评判甚嚣尘上。李大钊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在对待妇女问题上,他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批判压迫妇女的社会制度,他认为妇女若要求得解放,就“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

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5](P19)}在谈到娼妓问题时,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5](P349)}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针对旧的礼教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怎样做父亲》,及一些随感,对父权、夫权进行了无情地批判。他痛斥节烈只专对女子,与男子却毫不相干,他说节烈行为是“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与人生将来由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5](P122)}在《随感录四十》里,他对一个不相识的青年寄来的诗评论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5](P201)},高度赞扬了青年人对爱情的渴望。

再次,他重视妇女独立人格的培养。在评论赵五贞自杀事件的文章中他专有一篇文章题为“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在这片文章中,他认为人格的先决条件在于“意志自由”,赵女士因迫于父兄的命令而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因而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但她竟在最后一瞬以死抗争,以使自己的自由意志得以彰显。按说毛泽东并不赞成自杀这样的行为,但对赵女士的自杀,却“愿率天[下]人齐声高呼:‘赵女士万岁’”^{[4](P379)},就是因为赵五贞在血染柑子园时,她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4](P379)}。这说明他认为人格是高于生命的东西。在《非自杀》一文中,他比较了“自杀”和“奋斗被杀”两种方法,他更赞成“奋斗被杀”,因为“奋斗的目的,不存在‘欲人杀我’,而存在‘庶几有人格的得生’”^{[4](P393)}。可见他对人格的看重。毛泽东的妇女观是表现在他对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批判中的,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他非常重视恋爱自由,他认为恋爱绝不能受父母的干涉,更要打破媒人制度和婚姻中的迷信,全凭“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4](P399)},若要自由恋爱,必是“有着独立人格的男女才能做到”。

而倡导个性解放,以图个人自由正是新文化运动在前期的重要特征。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全盘性的批判,主张“以科学代宗教”,激扬理性,破除迷信,个人自主,人格平等。正如陈独秀所言:“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6](P407)}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可说围绕着妇女要有独立人格这个中心。胡适是对妇女解放运动较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是从批判贞操观入手的,认为贞操是起于爱情恩意,个人意志的,“诚意的贞操是完全自动的道德”^{[5](P113)},“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一种态度”^{[5](P108)}。因而个人是否守节应由个人自由意志去决定。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便提出妇女解放的问题,何谓解放?“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7](P312)}他批判传统的“三纲”,认为夫为妻纲,则妻无异于丈夫的附属品,不复有独立的人格,而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男女平等也无从谈起。

最后,毛泽东认为妇女解放的保证是经济条件。毛泽东

在《女子自立问题》一文中分析女子之所以“被男子欺负,至于数千年不得翻身”根本原因在于经济问题。他说,上古之时男女出于平等地位,这是由于“经济一项,女无所求于男,男无所求于女”之故。但随着人口的增加,食物不足,因而产生生存竞争,便使工作成为受重视的一项社会活动,但女子因有生育问题,在此期间不能工作,男子便乘机以食物为诱饵,以“服从”为交换条件压制女子,所以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实出于经济上的不平等。若要争取妇女解放,必首要争取女子经济上的解放。他开出的药方是:女子结婚前备足自己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以使自己能够经济独立,并需要预备产后的生活费,这样就可以在经济上不受男子的钳制而能达到男女的平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妇女解放运动可谓轰轰烈烈,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异常活跃。在各种思潮中,从经济独立角度做文章的不在少数,这方面的讨论也比较深刻。胡适为无名女子李超立传,鞭挞传统的家族制度,同时也提出妇女财产继承的问题。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中,关于女子解放的条件列出了七条,在经济独立方面他认为:“女子的地位,常随经济的变化为转移,女子也是‘人’,就当为生产者。这是社会所必需的经济要素,是左右个人的重要问题”^{[5][P45]}。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李大钊更是把经济问题看得很重,他认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8][P23]}。陈独秀是对毛泽东影响非常大的人,对于他来说,个人独立与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现代生活,以经济为命脉,而个人

独立主义,乃为经济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5][P101]}

毛泽东早年妇女观涉及到的内容不仅仅这几方面,比如他关于女子教育的问题,他呼吁女子联合以争取解放的问题等等,这些方面本文均为探讨。而毛泽东早年妇女观集中反映在1919年末所写的评论文章中,这也正是他思想转变的过渡时期,他正从一个自由主义者、民主改良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方面的深入探讨应有相应的成果,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 [1]新民学会资料[M].人民出版社,1980.
- [2]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M].1994.
- [3][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 [4]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 [5]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 [6]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 [7]张莲波.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历程[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 [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上接第115页)交换形成的无形约定和契约,是村落成员共意和村落公共领域形成的物质基础。正是这样的礼物与劳务的交换形式,使得村落的个体不再表现为个体,而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正是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产生了村落共意的基础和公共行动的动力。同时这种交换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也使村落表现出一种整体性伦理,这种整体性伦理是村落共同体成员通过自己的行动达成的,也是他们所追求的,符合村落内部人们的终极价值标准。这种价值标准就是村落公共性产生的根基。

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中,村落内部的价值标准因为社会转型而丧失,村落内部的交换因为商品交换的盛行而消亡,由此村落共意和村落公共性产生的基础也逐渐消亡,进而导致当前农村基层社会秩序的深刻危机。S村丧葬仪式中的交换及其背后的村落共意意涵,提供了当前重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公共性的借鉴和途径。

参考文献:

- [1]宋齐.1987年中国史前考古重大发现[J].新华文摘,1988(9).
- [2]道格拉斯·黄剑波,柳博赞,卢忱译.洁净与危险[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 [3]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4]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

论战为核心”[J].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第2期.

- [5]涂尔干.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6]特纳,黄剑波译.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7]魏捷兹.“澎湖群岛的村庙公司与人观”[A].黄应贵编.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C].台北:中研院民族学所,1995.
- [8]阎云翔.礼物的流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9]张江华.“血与土的变奏:广西田东县立坡屯的考察”[A].黄应贵编.云贵高原的亲属与经济工作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中研院民族学所,1999.
- [10]董敬畏.“关中地区丧葬中互惠共同体——以临潼区S村丧葬仪式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008(3).
- [11]Edited by Maurice Bloch Jonathan Parry.1982.Death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Lif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2]Roberi J. Foster.1990.Nurture and force-feeding:mortuary feast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ndividuals in a New Ireland society,,American Ethnologist (3):431-448
- [13]Van Gennep,A.1960.The Rites of Passage,London: Routledge &Keagn Paul.